

中国传统译学简述

伍 群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近年来,翻译界越来越重视开展译学理论研究,因为翻译事业的飞速发展呼唤着译学理论的有力指导。翻译理论的更新与提高,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所以译学理论研究者必须站在传统的基础上和原有的起点上开展研究工作。陈福康编著的《中国译学史》详细记述评说历代有代表性的译评家和译学流派的观点,勾勒出中国译学理论的轮廓,为翻译理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资料。在此书基础之上,通过梳理中国译学理论流变的线条,总结各阶段译学理论的主要特征,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旨在加强翻译爱好者的理论修养,提高实践能力;为译学理论研究者提供资料和管见,促进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中国译学史;主要特征;代表人物;主要思想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4)04-0127-03

近年来,翻译界积极开展译学理论研究,并取得了明显成果。但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更新和提高翻译理论研究,必须以传统为基础,必须首先研究中国传统译学史。陈福康按照中国历史的分期,把中国传统翻译史分为四个部分^[1]。本文在这一背景下,总结中国传统翻译史各阶段的主要特征、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

1 中国古代的译论

远在原始社会,各民族和部族之间就开始了交际和融合的过程,然而已无文献可查。只有到周王朝,才留下相关记载。中国古代翻译史起于先秦,止于至清乾隆年间。

中国古代翻译史上的一大特色是从东汉末年至北宋初年的佛经翻译。佛经翻译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东汉末年到西晋,是佛经翻译的草创时期,翻译人员主要是外籍僧人,翻译方法主要靠直译,甚至是“死译”、“硬译”,因此可信度不高,译者的译作没有产生大的影响;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是佛经翻译的发展时期,翻译由私译转为官译;第三阶段在唐朝,是鼎盛时期,主要译者为本国人,他们除了精通佛理以外还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其译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阶段;第四阶段在北宋,是结束时期。

从佛经翻译开始,翻译家们就开始总结实践经验,探

索翻译规律。早期,翻译家们多用“质”和“文”作为翻译的标准。“质”指的是“朴质”,即严格依照原文,不增不减,即直译;“文”指“辞彩”,既对译文加以修饰,使文章更为通达,即意译。早期“质派”的代表人物是。在中国,支谦的《句法经序》是探讨翻译的第一本书。他提出“名实不同,传实不易”和“因寻本旨,不加文饰”。支谦提到翻译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这也是质派早期的翻译观点。东晋时期的佛经翻译家道安继承和发扬了支谦的翻译思想,主张直译但反对死译,对当时佛经翻译出现的死译现象,总结出了著名的“五失本”和“三不易”的规律。他认识到两种语言的不同,允许“五失本”,但这只是从形式上要求译文比较接近于汉语的规格,没有从译文深层次的表意上做出突破性理论。尽管如此,他的理论在当时还是颇有影响力的,为许多译家所推崇,如隋代名僧彦琮。现存的我国历史上第一篇正式的翻译专论《辩证法》就是彦琮的大作。他对翻译要求“十条”,对译者要求“八备”,不光谈翻译还从翻译的修养方面谈,对提高译者自身素质和翻译水平有重大意义。

“文派”代表后秦僧人鸠摩罗什主张“依实出华”,“曲从方言,趣不乘车”,力求译文典丽,而又不损原意。他的译作在当时是“众心惬服,莫不欣赞”,很受人们的欢迎。玄奘则主张把直译和意译结合在一起,指出翻译“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开创了中国佛经翻译的另一新天地。

他提出了佛经翻译中著名的“五不翻”的原则,并为译经者进行了十一种详细的分工。对于玄奘所做的贡献,印度学者柏乐天称赞道:“他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他的业绩将被全世界的人们记着。”^[2]

中国古代翻译史上的另一大特色是在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翻译的主要内容是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义、古希腊哲学以及17世纪自然科的若干发现。在此次的西学翻译中,也有翻译家总结翻译规律。徐光启主张翻译科技方面和哲学类的著作。最具代表性的译作是《几何原本》前六卷。此译作由徐光启和利玛窦共同完成。他主张翻译必须做到真实且对当世有利;他还提倡翻译要从哲学方法角度论着眼。严格地说,这一时期的西学翻译,局限在上层的少数有识之士的圈子里,没有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只能算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

2 晚清民初的译论

近代翻译史起于鸦片战争止于“五四”运动。这个时期西学的传播,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已经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和保国保种成为第一要务。人们开始忧患中国的积弱,希望通过翻译西方书籍来实现救亡和启蒙的目的。林则徐决心通过学习西方技术来提高中国的实力,他开始派人了解西方、翻译西方书籍,被誉为“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随后的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翻译范围主要限于实用知识,应用科学和少数社会科学,其最大的贡献是统一了科学技术术语的翻译;第二阶段是甲午中日战争到辛亥革命,甲午之战惨败,洋务运动破产,特别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国势更加岌岌可危,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先进分子开始觉醒;变法维新的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必须寻找新的道路来保家卫国。这一阶段的西学输入运动随之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输入的内容,则以为当时政治服务的西方社会科学和哲学为主,主要贡献是统一了译名以及东学西渐^[3]。

这一时期的翻译事业取得如此较快发展,与翻译理论的不断突破是密切相关的。如马建忠、高凤谦、梁启超等人,最早提出广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倡快译和译日文书;严复、林纾、梁启超等人又带头号召翻译哲理书和文学书,使翻译的格局更为宽广,呈现一派新的景象。这一时期的译论也精彩纷呈,如有马建忠的“善译”说、梁启超的“译书三义”、罗振玉的“译书办法八端”、胡以鲁的“译名三端三十例”、严复的“信、达、雅”说等等。

近代中国最著名的翻译家当首推严复。作为中国介绍近代思想的第一人,翻译的“第一国手”,严复总结了大量的实践经验,第一次明确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严复曾写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信即译文忠实于原文,不歪曲原作者的观点;达指译文语言通顺,流畅地表达原作思想;雅指译文文字古雅,有文采。三者之间的关系:信为本,雅为表,达是两者的纽带。“信、达、雅”翻译标准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其次是被学术界奉为“鸿儒”的梁启超,他的翻译思想有四:(1)“翻译强国”思想:“译书三义”——“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才”;(2)“翻译文体革命思想”:提倡通俗语体;(3)翻译小说理论的影响;(4)翻译文学与佛典的关系,科学提出佛经翻译的三个时期^[4]。梁启超十分重视总结古代翻译理论,为译学史做出了突出贡献。

虽然这一时期的中文西化交流,规模比明末清初巨大地多,影响深远地多;翻译理论越来越成熟;翻译者从集体翻译发展到单个人的翻译,译作更灵活多变;在译文的语言上,白话文居多,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通过阅读译作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但这一时期仍然没有出现翻译理论专著,译论的形式主要是较短的序跋文章、长边论文或条陈、建议。我国译学的进一步繁荣,还有待于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运动。

3 民国时期的译论

1919年以后,受“五四”思潮的影响,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进入转折时期,其特点如下:(1)取代了过去“豪杰”译,任意增删等弊端,史译文更切合于原文,大大提高了翻译质量;(2)译文大多采用了白话文;(3)着重于外国科学名著的介绍;(4)开始有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一时期陆续涌现出一大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大家,如鲁迅、郭沫若、林语堂等。

这个时期翻译理论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长足的发展:鲁迅的翻译思想:(一)“易解、丰姿”双标准论——翻译须兼顾两方面:求其易解和保存原作的丰姿;“移情、益智”双功能说;(二)“宁信而不顺”; (三)“重译”和“复译”; (四)翻译批评:“挖烂苹果”的思想; (五)“翻译应与创作并重”的思想^[5]。鲁迅的翻译思想几乎涉及了翻译问题的各个方面,并且都是非常深刻的,大大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6]。“创造社”的挂帅人物郭沫若也对翻译理论做出过重大贡献。“创作论”是他整个翻译思想的灵魂。郭沫若首先指出译家不是鹦鹉名士,好的翻译等于创作,进一步提出风韵体、共鸣说和生活体验论,最后强调译文同样应该是一件艺术品。这一时期的另一大家是林语堂。在中国译学史上,他第一次最明确地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作为翻译理论的“学理剖析”的基础^[7]。基于以上两点,林语堂提出翻译的三条标准:“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林

语堂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对翻译思想作的新探讨,对推进翻译理论具有很高的价值。

民国时期,只有短短30年,但却是我国传统翻译思想取得较大进步的时期,为迎接其鼎盛时期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4 新中国成立后的译论

1949年以后,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进入鼎盛时期。文艺学派创作的“四论”是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四论”由茅盾的“艺术创作性翻译论”,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式”论,钱钟书的“化境论”和焦菊隐的“整体论”组成。

茅盾认为,对于文学作品,不仅要用明白畅通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还要“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8]。他指出,艺术创作性的翻译对文学翻译是具有极大意义的。傅雷极为重视译者的专业修养,强调译者本身的条件、气质和对原作的“适应力”^[9]。他继承前人观点,结合自身修养,总结出了“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观。钱钟书认为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的东西^[10]。“化境论”中的“化”是翻译艺术的极致。焦菊隐提出“整体论”,他认为翻译孤立的句子时,要辨清字和词的“相对价值”;翻译篇章时,要注意“意念的联系”和“思想的过程”。“四论”标志着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走向成熟,为传统翻译理论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但文革期间,译作很少,翻译研究基本停于现状;改革开放初期,翻译研究也无较大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谭载喜等人主张“必须建立翻译学”的呼声日益高涨,翻译理论研究蓬勃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是中西翻译思想相互影响的最大时期。此阶段的研究原则是继承传统、借鉴西学、发展自我。传统的翻译活动重视翻译原则与实践,而新时期的翻译侧重理论与学科建设。

要开展翻译工作研究,提高译学理论水平,就必须首先研究中国译学理论史。本文以时间为脉络,记述评说了各阶段翻译思想的主要特点、有较大影响和意义的译论家及其观点,有助于翻译爱好者的理论学习与翻译实践,为翻译理论研究者提供材料。

参考文献:

- [1] 陈福康. 中国译学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 [2] 方华文. 20世纪中国翻译史[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
- [3] 马祖毅. 中国翻译史[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 [4] 梁启超. 变法通议[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 [5] 鲁迅. 为翻译辩护[N]. 申报·自由谈,1933-08-20(2).
- [6] 王友贵. 翻译家鲁迅[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 [7] 林语堂. 语言学论丛[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8] 茅盾. 茅盾论文选集[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 [9] 傅雷. 翻译经验点滴[N]. 文艺报,1957-06-01(1).
- [10] 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J]. 文学研究集刊,1963(1):1-29.

(责任校对 谢宜辰)